

## 第4课 盛唐气象

### 内容标准

通过经济繁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唐诗的盛行,了解盛唐的社会气象。

### 一、教学立意

通过认识唐朝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和诗歌兴盛三方面史实,了解盛唐社会气象,浅析其原因。

### 二、教学目标

知道唐朝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的发展。知道唐都长安既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开放的国际大都会。知道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了解大唐强盛的表现和宽容、开放的社会风气。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观察教材配图,辨析史料,初步理解史料呈现的历史信息并认识不同史料的历史价值。

### 三、教材分析

#### 1. 内容主旨

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文化昌盛,呈现盛唐气象。

#### 2. 主旨诠释

盛唐气象是指唐朝鼎盛时期的总体风貌。盛世是治世,以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强盛为主要特征。大唐盛世,政治上,疆域辽阔,边地安稳;经济上,农业技术革新、手工业兴盛、商业发达;文化上,诗歌极盛,名家辈出,别具风格。国家的富强使得唐人充满自信,对外宽容、开放,对新事物勇于尝试、兼收并蓄,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 3. 要点分析

本课由“经济繁荣”“社会开放”“诗歌兴盛”三目组成,为盛唐气象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的表现。

第一目“经济繁荣”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展现了盛唐经济的繁荣。农业方面,随着农业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生产力得到提升,垦田数量、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农业的发展,带动手工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手工制品为满足人们的需求越发精致,追求艺术性和

实用性的结合。生产决定消费,生产环节的提升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累加也带动了消费市场的扩大,商业因此兴旺。一些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如长安、扬州、广州等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城中专门设立“市”以便交易,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而良好的消费也促进生产的进步。经济的全面繁荣铸造了强盛的国力。

第二目“社会开放”。强盛的国力是社会宽容、开放的底气。唐都长安不仅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会。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各国客商、学子、使节云集。各国的商品和文化在此交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唐人的日常生活。唐人亦乐于吸收不同的域外文化,“胡风”尤盛,领一时之潮流。

第三目“诗歌兴盛”。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社会的宽容、开放使诗歌的创作挣脱了束缚,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熏陶。唐代被视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初唐方兴未艾,诗歌格调激昂豪迈,如一股清新之风,充满朝气。盛唐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群星璀璨。“诗仙”李白浪漫飘逸、狂放不羁;“诗圣”杜甫凝练沉郁,关注社会。通观唐诗发展的历程,会发现它与唐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 1. 重点

唐朝开放、宽容的社会风气。

### 2. 难点

展现和解读盛唐气象。

## 五、教学设计建议

### 设计一：讲述法

#### 导入新课

教师课前准备“唐长安城示意图”,课上展示并以此为切入点展现盛唐气象。长安城始建于汉代,隋文帝时对其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建并定名为大兴城。唐长安城在大兴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而成。唐长安城总面积达84平方千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

#### 1. 经济繁荣

让学生观察长安城的布局特点:街道严整齐密,如棋盘状。宫城是皇帝及皇族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皇城是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外郭城是居住区和商业区。居住区称“坊”,为封闭式;商业区称“市”,坊市分离。东市和西市是长安城内两大商业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商人多在这里聚集。商业的繁华是建立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的。关于唐朝在农业、手工业上持续发展,可指导学生阅读课本小字部分理解农业工具的革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介绍“唐代鸚鵡纹提梁银罐”和“黑釉三彩马”以说明当时手工业技术的精湛。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得在“市”中,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能买到自己所需的物品。

## 2. 开放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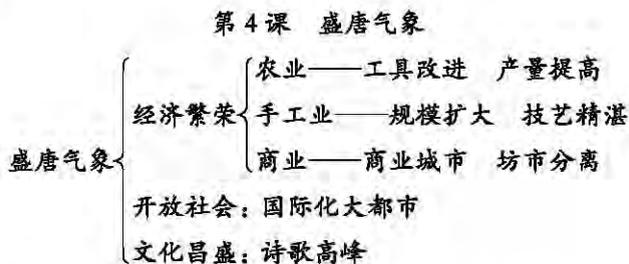
长安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大都会。它容纳了不同肤色、不同服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文化背景的异乡人。他们中有日本、朝鲜的使节、天竺的僧人和波斯、大食的商人等。有的来观光学习,有的来经营商业,还有的在唐政府供职。域外的各类物品(金银珠宝、胡饼、毕罗、葡萄酒等)及音乐、舞蹈、绘画、医药、宗教等大量传入中国,“胡风”盛极一时。可结合长安城妇女穿胡服戴胡帽的图片和课文小字对唐音乐、舞蹈的介绍与教师用书中相关课文注释,展现和解读唐王朝自信、宽容、开放的社会风气。

## 3. 诗歌的兴盛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能够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与当时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开放的盛唐气象有直接的关系。再加上一大批诗人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广泛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最终形成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盛景。

可参考课文注释中“唐诗的成就和特色”条,简单介绍唐诗的发展历程和各流派的代表人物,重点说明唐诗的发展历程与唐代社会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附: 板书设计:



## 设计二: 讨论法

本课涉及唐朝的社会生活,十分生动有趣,可以将学生充分调动起来,一起“梦回大唐”。让学生预习课文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一小点就可以,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是“以小见大”),查阅资料后形成文字、图片或影像等。教师可选取有代表性的成果,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向大家展示,描述他们所发现、感受到的盛唐气象。教师在最后不下定论,适当引导总结即可。

# 六、习题分析

## 1. 读图学史

史料,简单分为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者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历史风貌。

文物属于实物史料。学生收集时,可从文物的功能入手,进行划分。比如礼器、食器、兵器等。以此观察盛唐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了解唐文明的发达程度。也可从文物的装饰风格入手,描摹唐人的审美和精神世界。在学生学情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继续深入,引导学生探讨形成这些繁盛景象的因素。

## 2. 课外学史

杜甫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下面以他的诗为例进行分析,仅供参考。

盛唐气象与社会现实举例:

### 《忆昔》(节选)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杜甫的《忆昔》是描述盛唐景象最为著名的诗作,作者在经历“安史之乱”的动荡后缅怀开元年间社会安定、物质充实的昔日盛况,与现世的残败形成鲜明对比,借此抒发希望唐能中兴,再现盛世的情感。

个人理想举例:

###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25岁的杜甫赴长安参加贡举考试,结果落榜,于是就在齐赵一带(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四处漫游,《望岳》大约就写于这前后。岳:山高谓之岳,这里特指东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市北。青年杜甫以这首诗热情赞美了泰山的雄伟气象,同时表达了自己积极进取的人生志向。虽然眼下未得志,但诗人相信自己终能有所成就,攀越顶峰。

## 3. 思考与讨论

教师可多方面启发学生,让他们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归纳和概括。如:强大的国力,经济的繁荣,为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对外政策,为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氛围;唐人在文化领域继承和发展了优秀传统文化,厚积薄发,将唐文化推向鼎盛。

## 七、课文注释

### 1. 唐代前期的经济发展

唐朝前期的百余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不断发展,逐渐臻于繁荣。

当时的农业生产,依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已有了不少发展。唐代的犁有较大改进,犁铧上部加宽,装有犁壁。耕田时,犁壁可推开犁铧翻起的土块,便于深耕。犁辕不论曲直,都较先前减短许多,由此提高了耕作速度。此类改进过的犁比较省力,一般用单牛曳引。有齿的耙和砺磳、有觚棱的磳磳,当时已普遍使用。耕地后使用这些农具松土碎土、平整田面,对于抗旱保墒,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很有作用。当时的镰刀,两头窄,中间宽,较前代的镰刀更便于收割。汲水工具除桔槔和辘轳,北方地区,“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水车,已开始被用于农田灌溉;长江流域,出现了筒车,其形状类似纺车,四周缚以竹筒,随水流自行旋转,由竹筒将水汲至高处。唐朝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国家制定了《水部式》,其中即有关于灌溉的法规。唐代耕地面积有所扩

大,据时人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元结《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天宝十三年(754年),唐王朝所统治的户口数增加至906万户,人口数增加至5288万。而据杜佑的估计,当时实有人户当有1300万至1400万户。

当时的私营手工业,以纺织业为主要的的手工业部门。丝织业的中心仍在河南、河北地区,当地民众向政府缴纳的庸调,一般都是绫、绢、缣。宋州和亳州的绢,质量为全国之首。定州每年常贡的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的绫,达到1500多匹,较其他地区高出约百倍,是当时重要的丝织工艺品产地。剑南诸州,普遍出产丝织品,其中,益州的织锦尤负盛名。山南、淮南和江南的一些州县,丝织业也比较发达,扬州的锦袍尤为著名。

唐朝的冶铁业,因政府在官府收税的前提下,允许私人经营采矿、冶铁,所以铁冶分布很广。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统计,在山东、河北、河东、剑南一带,铁矿约有40余处。兖州莱芜县西北的韶山,自汉及唐,鼓铸不绝,是一个重要的铁产地。江南地区铁冶约有20余处,产量也不断增加。冶铁业的发展对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农业生产。唐朝政府还对铁农具的制作采取免税政策,以资鼓励。

瓷器的制作技术在当时也有很大进步。越州的青瓷“类玉类冰”,邢州的白瓷“类银类雪”(陆羽《茶经》卷中《盃》)。洪州的名瓷酒器和茶具,也深得人们喜爱。《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南府开元时贡白瓷,杜甫曾说邛州大邑的白瓷碗胜过霜雪。根据现今的考古发掘,在巩县和大邑均发现了唐代窑址。饶州浮梁昌南镇(即今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自唐初以来,就有假玉器之称。据考古发现,早期景德镇的瓷器青白兼有,尤其是胜梅亭发现的唐代白瓷,瓷胎白度已达到70%,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铜器的主要产地有扬州、并州、越州、桂州等。扬州的铜镜尤为著名,有“百炼镜”之称。在中原地区的唐墓随葬品中,铜镜最为常见,花纹装饰的种类很多,构图自由奔放,线条刻画流畅,此外,还有螺钿镶嵌的铜镜。

纸张和笔、墨、砚的生产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益州的麻纸,杭、婺及衢、越、信等地的藤纸,以及蒲州的薄白纸,最为著名。此外,宣州、常州、均州等地,也盛产纸张。毛笔制作,以宣州溧水出产的兔毫笔最为精妙。名墨的产地有绛州、潞州、易州等。砚的制作,虢州的产品非常著名。

唐朝前期的百余年,城市、商业和交通也伴随农业和手工业一同发展。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要冲,成为较大的商业城市,最著名的有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广州、荆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凉州等。城市中的坊主要是住宅区,四周围以高墙,市则是手工业和商业场所。当时除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各州治和多数县治,也都设有市。市有市令,主管市门钥匙,按时启闭市门。唐代的《关市令》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两京诸市署》)市令还掌管市内交易之事。市的各行都有行头,负责一行的事务,主持向官府纳税的事宜并与官府交涉其他事项。当时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主要为贵族、官僚服务。城市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如铜镜、毡毯、绫锦、锦袍、乐器、金银器、酒类等,也大多供应本城和其他城市,很少与农户的需要相联系。

当时,运输货物的道路贯通全国。驿道宽广,每隔30里有一驿站。驿道交通以长安为中心,

“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饌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杜佑《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水路运输也很发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发挥了很大作用。南方地区，更有众多河流、湖泊构成巨大的水道网，将各个城市联结起来。据《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 2. 唐代的长安城

唐长安城（隋时称大兴城）位于今西安（包括其附近郊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等研究单位对隋唐都城的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以及城内的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依据考古发掘所得的资料，结合文献的有关记载，我们能大致复原隋唐长安城的总体面貌以及当时城内市民生活的状况。

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到隋朝时已有近800年的历史。由于原城过于狭小，宫宇多朽蠹，供水、排水等设施陈旧不堪，已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诏开始营建新城，新城的总体规划、设计由当时著名的设计师宇文恺负责。开皇二年六月，新城开始动工，至当年十二月基本竣工，次年三月正式入迁使用，其建设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唐朝建立以后，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上又有所修建，仍以之为都城，并将其改名为长安城，整个长安城的筑城工程前后历时约半个多世纪。

隋唐长安城是世界古代十大城市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总面积达84平方千米，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宫城是皇帝及皇族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城为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长2820.3米。四周夯筑有围墙，墙基宽14至18米。宫城内有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

皇城又名子城，是政府机关的所在地，皇城不设北墙，紧附于宫城之南，其间仅有一条“横街”相隔。“横街”有300步之宽（约合441米，今测得残存的约有220米），是宫城与皇城之间的一个开阔广场。这么宽的广场究竟有何用途，目前尚难确知。有学者认为，这是出于宫城安全的需要。皇城无北墙，故站在宫城南墙上，可以俯视皇城，洞察百司，起到严密监视的作用；“横街”建得很宽，早已越出一箭之遥（60米），对宫城的守卫也极为有利。皇城也为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皇城有7座门：南面3门，中为朱雀门，东为安上门，西为含光门；东面2门，南为景风门，北为延喜门；西面2门，南为顺义门，北为安福门。皇城的所有大门均与城内的大街相通。

外郭城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拱卫皇城和宫城，是百姓、官吏居住和开展商业活动的区域。外郭城的形制东西较长，南北略窄，城内有南北向11条大街，东西向14条大街。南面3门，正中为明德门，东为启夏门，西为安化门；东面3门，北为通化门，中为春明门，南为延兴门；西面3门，北为开远门，中为金光门，南为延平门；北面3门，均开在北墙的西段，中为景曜门，东为芳林门，西为光化门。南面的明德门最大，设有5个门道，其他城门均设3个门道。长安城的街道均作南北、东西向的排列，笔直端正，以宽达155米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11条南北向的大街和14条东西向的大街，把外郭城划分为100多个整齐划一的里坊。诗人白居易曾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

如种菜畦”的诗句来描绘长安城的布局。城中的街道都较宽,通向城门的街道宽度一般都在百米以上,不通城门的街道宽度也在42至68米之间,四周沿城墙内侧的街道最窄,为20至25米。街道两旁有水沟,并植有槐树和榆树。尤其是朱雀门与宫城承天门之间的天街(亦称承天门大街),是百官衙署的集中地,街道旁槐树成荫,有“槐衙”之称。

长安城的里坊共有110个(一说108个),以朱雀大街为界,街东归万年县管辖,街西归长安县管辖。坊为封闭式的住宅区,均作长方形,坊的周围筑有高3米左右的墙,一般四面各有一坊门,坊内的街道呈“十”字形。住宅的门均面向坊内。坊门启闭有时,每日,天明擂动街鼓,坊门方才打开;日暮再擂街鼓,坊门随之关闭,坊门有专人看守,宵禁后禁止出入。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夜晚允许百姓开坊门上街。唐代的长安城街道虽然宽阔,但街道两旁都是高大的坊墙,走进街道,犹如进入一条胡同(这和宋代以后城市中的街道两旁可以沿街开店设铺大不相同)。城中的东市、西市是专辟的商业区(东市隋代称“都会市”,西市隋代称“利人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有东西、南北向的大街各两条,呈“井”字形把市场划分为9个方块。每方的四周均临街,店铺即开设在各方的周围。根据《长安志》的记载,长安、万年二县共有人口8万余户,按每户4至5口计,长安城及其郊区的人口,大约在40至50万。若加上皇族、士兵、奴仆闲杂、佛教僧尼,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各国的人口,整个长安城的人口可能达到100万左右。长安城的规划设计,不仅宫城、皇城和外郭城都有隔离,而且居住生活的里坊与从事商业买卖的东西市也是分开的,这是中国古代坊市制城市的主要特点。

长安城人口集中,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寺院众多,全城有寺院150多所,为全国之冠。根据《唐两京城坊考》的统计,唐代长安有僧寺81所,尼寺28所,道士观30所,女观6所,波斯寺2所,胡祆祠4所,其中最著名的是慈恩寺和荐福寺。慈恩寺位于城中晋昌坊内(今西安城南4千米处),建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寺内有楼阁式砖塔一座,名为大雁塔。荐福寺位于安仁坊内(今西安城南1.5千米处),建于684年,8世纪初又在寺内建密檐式寺塔,名为小雁塔。隋初在修建大兴城时,就开凿了不少城市用水的渠道。到唐代,进一步开发水源,疏凿渠道,使城市水量更加充沛。长安城水源丰富,渠道交错纵横,除了城市生活、绿化用水外,还建成了许多风景区。如太极宫有山水池、大明宫有太液池、兴庆宫有龙池。城东南的曲江池在秦汉时即为风景名胜,到唐代,曲江池的水量剧增,成为长安最大的风景区。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曾一度攻陷长安。德宗时,朱泚窃取长安自称楚帝。僖宗时,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攻据长安。其间,各方势力争夺攻占之地均在宫城禁苑之内,摧残、破坏、焚毁之事,屡屡发生,城内有较大的破坏。对长安城进行最彻底的破坏的是唐末农民起义的叛军将领朱温。904年,朱温劫唐昭宗迁都洛阳,命令长安居民“按籍迁居”,把长安的宫殿房屋全部拆毁。木料“自渭浮河而下”,运往洛阳,长安城中“连甍(屋脊)号哭,月余不息”。经过这一次浩劫,数百年的帝都成为一片废墟。

### 3. 长安城的商业

长安城的东、西两市是商店和作坊的集中地,也是整个长安城的经济中心。那里,店肆繁多,

商贾云集。市场的商品买卖仍然沿袭传统,每天中午击鼓 300 下,表示市场开始营业,日落之前击钲 300 下,表示市场要停止营业。市场的商品种类很多,出售同一类商品的叫“行”。东市有 220 行,220 行共有多少店铺,文献中没有记载,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一段记载说,会昌三年(843 年)六月二十七日夜间东市失火,“烧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由此可见,220 行的店铺数量一定非常可观。唐初,西市的店肆和商业规模大体与东市相仿。唐高宗时,皇宫由太极宫迁到大明宫。开元、天宝之间,唐玄宗听政、起居于城东的兴庆宫。于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也随之迁居到大明宫、兴庆宫附近,或到朱雀街以东的里坊里营建宅第,部分商贾不得不迁往西市贸易,结果西市的贸易繁荣度超过了东市,当时称西市为“金市”。

东市有笔行、乐器店、丝绸店、铁器行、印刷行、肉行、毕罗肆(毕罗是一种西域传来的美食,很可能就是手抓饭)、酒肆等,西市的店铺门类更多些,有饭馆、酒店、书店、服装店、大衣店、乐器店、药铺、秤行、笔行、肉行、鱼行、铁行、法烛行、金银行、鞍辔行,以及寄附铺(即寄售商铺)等。为了便利商人的商品买卖和保障商人现金的安全,西市还设有专门用来存放商人现金的“柜坊”,这种“柜坊”不同于现今的银行,商人向“柜坊”存入现金(铜钱),不仅不能获得利息,还要交纳一定的保存费。“柜坊”所存放的钱款数量很大,有时政府还向“柜坊”借款。比如,建中三年(782 年),德宗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向“柜坊”借钱。到唐代晚期,商人们又发明了一种类似于今天“汇票”的“飞钱”,“飞钱”也称“便换”,这样,商人就可以不用随身携带大量铜钱,而以货币汇兑的方法来从事一些大额的商品买卖。

除了东西市以外,一些里坊内也有不少小商店和手工作坊,尤其是到了唐代末期,里坊内的店铺更加普遍。比如永兴坊有卖鱼的,长乐坊有卖酒的,宣平坊有卖油的,延寿坊有卖金银珠玉的等。当然,这些里坊内的店铺规模都比较小。里坊内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比如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道政坊、常乐坊有酒坊,崇仁坊有造乐器的作坊,延寿坊有玉器作坊。一些里坊内还有不少饮食店铺,如胜业坊有蒸饼店,颁政坊有馄饨店,长兴坊有毕罗店。布政坊、延福坊、兴道坊、务本坊、长兴坊、靖安坊、宣平坊等,有旅店和邸店(代客保管钱财、存货卖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还一度出现了夜市,崇仁坊里不仅有商业店铺,而且“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官方屡次取缔,但仍不能见效。夜市的兴起,是商品经济繁荣的标志,也是对封闭式的坊市制的冲击,它的出现表明隋唐时期封闭式的坊市制将逐步走向后来开放式的城厢制。

长安城聚集了许多来华经商的外国人,尤其是从西域来的胡商,他们在长安城中非常活跃,经营各种富有特色的生意,特别擅长于金银珠宝业。胡商大多有鉴别珠宝的本领,都聚集在西市做金银珠宝生意,长安城金银珠宝业几乎被胡商垄断。他们中有不少已是豪富巨商,十分有钱,唐僖宗时,政府发生财政困难,竟打算向胡商借钱,后被人劝阻才未开口。胡商经营的饮食业,也驰名长安,麻饼、毕罗、葡萄酒等很受唐人欢迎。近年来在西安等地出土了不少古代外国的货币,有拜占庭金币、阿拉伯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日本古代银币等,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外贸易的兴盛。

#### 4. 鸚鵡纹提梁银罐与唐代金银器的生产

鸚鵡纹提梁银罐出土于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内的窖藏里,罐高 24.2 厘米,口径

12.4 厘米,以折枝花围绕鸚鵡组成图案装饰于腹部,颈、足则饰以海棠花瓣,提梁插入焊接在肩部的两个葫芦形附耳内,可自由活动。该罐造型精美,结构巧妙,装饰雅丽华贵,制作工艺精细,为盛唐金银器的代表作,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安南郊何家村的唐代金银器窖藏发现于 1970 年 10 月,在两个高 65 厘米、腹径 60 厘米的巨瓮和一件高 30 厘米、腹径 25 厘米的大银罐中,贮藏了金银器、玉器、宝石、金石饰物、金银货币、银铤、银饼和药材等千余件文物。其中金银器物达 265 件,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这批文物可以分为:食器类、饮器类、药具与药物类、盥洗器、日用品、装饰品、货币类等。其中,饮器类的兽首玛瑙杯,是从波斯传入的;药具和药物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较为少见;货币中除了有中国的从春秋到唐代的各种货币外,还有日本元明天皇时的银币,东罗马的希拉克略金币、波斯的库斯鲁二世银币等,应是当时中外交通贸易繁盛的标志。何家村金银器中有纪年铭刻的,最迟是开元十九年(731 年)的庸调银饼。根据唐代花纹及金银器形制的编年,这批文物的年代上限可早到 7 世纪中叶,下限可到 8 世纪中叶。

大唐盛世,经济的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宫廷贵族的需求,刺激了金银器皿的生产。唐代的金银制造业相当发达。唐玄宗即位后,为提倡节俭,纠正宫中奢靡之风,曾一度下令将宫中的金银器玩、车马银雕金饰等通通销毁,充作军国之用。将珠玉、锦绣,置于殿前销毁,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珠玉锦绣。由此可见,当时宫廷里金银器皿的数量甚多。从何家村所发现的这些金银器皿来看,主要有钣金件和浇铸件,加工的工艺已经相当先进。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被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不易被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紧密,很少有物件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时切削加工技术已趋成熟。窖藏中还有一件镂空银熏球,球中间用两个机环架构,转轴相互垂直,里层放置香料,点燃以后,不论球体怎样转动,香料都不会侧转倒翻,其原理和现代航空陀螺仪的万向支架一致。许多金银器上都用墨书标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也为测定唐代衡制提供了条件。这些文物为研究唐代的金银器皿的制作以及衡制、赋税、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窖藏中还出土了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贵重药材和炼丹器皿以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显示了唐代药理学的发展与成就,反映了唐代炼丹的盛行。

## 5. 唐三彩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的制陶工匠已经掌握了铅釉技术,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只能生产出黄色或绿色的单色釉陶。直到唐代,才创作出一种多色的釉陶,即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其釉彩以青、绿、黄为主色,故称“唐三彩”。其实,唐三彩的釉彩远不止青、绿、黄三种,它包括黄、赭黄、浅绿、深绿、蓝、褐、黑、白、紫等色,有人认为称其为三彩,也含有多彩之意。

唐三彩以白色黏土为陶胎,用含有铜、铁、钴、锰等元素的矿物作釉料的着色剂。唐三彩的制作采用二次烧成法,第一次为烧胎,称为素烧,温度约在 1000℃ 左右。完成以后上釉,即给素胎

刷涂均匀且有一定厚度的釉料,再进行第二次釉烧,温度大约在 800℃左右。在燃烧过程中,釉料里的金属会被充分氧化,于是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如氧化铜呈绿色,氧化铁呈黄色或褐色,氧化锰呈紫色等。釉料在受热熔化过程中会向四周溢出和流动,形成各种颜色的相互浸润交融,使得烧制成的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由于釉料中加入了适量的铅作为助熔剂,唐三彩的釉面更光亮,色彩也更美丽。

根据对现今所发现的考古资料的研究,唐三彩的制作兴起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鼎盛。开元时期,社会盛行厚葬,贵族达官为夸耀财富、追求奢侈排场,多用唐三彩俑作为陪葬品。凡死者在世时所需的文武侍卫、歌舞乐工以及马、牛、骆驼、车子、瓶罐碗盘、房屋家具等,均有三彩陶器制成的明器陪葬,在洛阳、西安等地的唐墓中往往一个墓就出土百余件唐三彩。此外,各种人物、牲畜造型的唐三彩也可用作厅堂摆设和馈赠礼品。“安史之乱”后,唐三彩的制作逐渐衰落。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和艺术成就均为后来的辽三彩、宋三彩所直接继承,尤其是铅料的应用,为元代以后青花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6. 长安城里的“胡风”

唐代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都市,在这里可以看到来自西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他们带来了与汉族迥然不同的生活习俗。在唐代,人们常把西域不同国度、民族的人,统称为“胡人”,把这些民族的生活习俗称之为“胡风”。长安的居民在与胡人接触往来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也融入了许多胡人的习俗,尤其是在饮食、服饰等方面,其影响之大几乎使胡风演变成一种社会生活上的时尚。

饮食方面:唐人较喜欢的胡食有毕罗和胡饼。据研究,毕罗即一种将肉类、果菜等合煮的饭,类似于现今在中亚、印度和我国新疆等地仍盛行的抓饭。唐代长安有许多专卖毕罗的店肆,卖毕罗以斤计,饭中还放有大蒜。胡饼是一种夹馅烧饼,汉魏时从西域传入中原,到唐代已经成为百姓十分喜欢的常食。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当时在敦煌地区的僧人和工匠都吃胡饼。胡饼个头很大,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地里曾出土一个唐代胡饼的实物,它直径达 19.5 厘米。

服饰方面:唐时穿胡服戴胡帽成为一种时尚。唐初宫中及富贵人家的妇女多盛行戴幂䍡,这是一种来自西域的遮蔽全身的骑马装,上部为笠状帽子,帽檐周围有下垂的布帛,长可过膝。唐高宗以后,幂䍡不再流行,妇女们开始戴帷帽。帷帽与幂䍡相似,只是下垂的布帛较短,只及脖子。妇女头戴帷帽,乘坐“担子”(肩舆),由仆人抬着出行。为此,朝廷多次下令禁止。咸亨二年(671年)的敕文说:“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幂䍡,曾不乘车,别坐担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于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可见帷帽风尚,虽数下诏令仍禁而不止。唐玄宗时,帷帽又不流行了,妇女们时兴戴胡帽,胡帽是对来自西域或吐蕃等地的帽子的统称,种类很多,胡帽不再有任何遮蔽颜面的帷裙,通常的样式是帽顶较尖,有上翻的帽耳,缀有毛皮或毡,还绣有花卉。唐玄宗以后,服饰时尚又发生变化,长安妇女开始不爱戴帽子,流行“露髻”出行,更以穿着男子袍衫靴子为时髦。

“安史之乱”以后,胡服“回鹘装”又流行起来。回鹘是唐代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安史之乱”

时,唐政府曾借回鹘兵平定叛乱。“安史之乱”以后,唐与回鹘的关系逐渐密切,“回鹘装”也由此在中原地区风行一时。唐代诗人花蕊夫人的《宫词》曰:“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饌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长安城中“胡风”之盛可见一斑。

## 7. 隋唐时期对少数民族及外国乐舞的吸收与融合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推动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西域各族和周边各国的乐舞陆续传入中原。早在十六国时期,大批中亚、西亚和印度人陆续进入中国,其中就有不少乐舞艺人。前凉王张重华时(346—353年),天竺乐和乐伎已传到凉州(今甘肃武威)。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是古代的歌舞之乡。前秦派吕光征西域,于384年攻占龟兹,当地的“奇伎异戏”被带回凉州,其欢快的旋律、鲜明的节奏和异国的情调深受人们的欢迎。龟兹乐传入后又与凉州及中原的乐舞相结合,形成了名噪一时的西凉乐,盛行于南北朝至隋唐数百年间。435年,魏太武帝派人出使西域,又带回了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和疏勒一带)、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一带)的乐舞。十六国时期,高丽乐也传入了北燕。436年,北魏灭北燕,获得了高丽乐。577年,北周灭北齐,高丽、百济曾派使者到长安献乐。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女子阿史那氏做皇后,她带着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的乐舞队来长安表演,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

西域各族及周边国家的乐舞在隋唐时期被进一步吸收和融合,使唐代出现的任何一种类型的乐舞,都呈现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面貌。例如,唐代的十部伎乐舞是一组大型的宫廷宴乐乐舞,也是初唐时期大型乐舞的代表。据《唐六典》记载,其节目次序是:燕乐伎、清乐伎、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国伎。可见,其中华夏乐舞仅有三伎,而印度乐舞有一伎,高丽乐舞有一伎,西域乐舞则多达五伎。虽然十部伎基本上在宫廷演出,但它们也影响了宫廷以外的舞蹈。如《康国乐》曾以《胡旋舞》的名义在各地流传;《龟兹乐》的乐器、乐曲和舞蹈风格也被《五方狮子》《破阵乐》《万斯年》等乐舞吸收。

盛唐时期,用于宫廷宴会的大型乐舞是取代十部伎的二部伎乐舞。从有关二部伎乐舞的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它多方面吸收了外来因素。如《安乐》的舞蹈姿态“作羌胡状”,《太平乐》采用了源于西域的狮舞形式。

唐代的教坊乐舞分为健舞、软舞两大类,而这些舞蹈的绝大部分,都融入了少数民族及外国的舞蹈风格。此外,当时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民间乐舞,如具有歌舞戏性质的散乐歌舞,在民间节庆活动中集体表演的踏歌舞,以及酒令歌舞、巫舞、傩舞等,也都表现出华夷融合的特色。如主要流行于中国北部的散乐歌舞,就是在西域幻术和戏场风俗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中的《拔头》戏舞表演的是西域人杀虎报父仇的故事,而《苏莫遮》则源于西域的乞寒风俗歌舞。又如酒令歌舞中有来自西域的《刮骨盐》,有源于波斯打马球或蹴毬游戏的《抛毬乐》,而《三台》《回波乐》《倾杯乐》等采用的急拍子乐曲,也源自北方少数民族。赛神歌舞中,也有随西域祆教传入的舞曲《穆护砂》。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许多少数民族或外国的乐器也传入了内地,其中较重要的有: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箏、方响、铎、钹、星、达卜、腰鼓、齐鼓、担鼓、羯鼓等。据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代的乐器已有300种左右,许多外来的乐器在唐代的乐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上述事实说明,唐代音乐、舞蹈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正是在广泛吸收、融合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的基础上出现的。

## 8. 唐代的《秦王破阵乐》

《秦王破阵乐》又名《七德舞》,为唐代的宫廷乐舞,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之一。最初用于宴享,后用于祭祀。这一乐舞的详细情况现已无法详考,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了解其大概。据《隋唐嘉话》《旧唐书·音乐志》《太平广记》《通典》《唐会要》等记载,620年,秦王李世民击破叛将刘武周,解唐之危,河东(山西永济)士庶歌舞于道,军人利用军中旧曲填唱新词,欢庆胜利,遂有秦王破阵之曲流传于世,其后该曲又被编入乐府。贞观初年,唐太宗诏魏徵等增撰歌词7首,又令吕才协律度曲,订为《秦王破阵乐》。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对舞蹈进行加工,其舞队变化有: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等。舞蹈者120人(一说128人),身穿银饰盔甲,手中持戟,舞蹈队形先为左圆右方,前有战车,后有队伍,时而变为横阵,好似鱼儿比次而行,时而变为纵队,有如鹅群前后相随,有时中间成箕形张开,两翼舒展,队伍时屈时伸,相互交错,最后首尾相应,连接在一起。全舞模仿战阵,分为3大段,每段4次变换阵型,合计12阵,伴奏用大鼓,乐调有龟兹声,时快时慢的击刺动作皆合着雄壮的歌声,具有浓厚的战斗气息和威武的气势,表现出李世民执政初年的兴盛气象。据载,此乐舞用于宴三品以上的官员及“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外奏之。擂动大鼓时,声震百里,气壮山河。后又用马军2000人引导舞队入场,场面更为壮观。

唐高宗时,此舞被改为《神功破阵乐》,成为祭祀时所用的“武舞”(相对“文舞”而言)。唐玄宗时的《小破阵乐》,也源出《秦王破阵乐》,只是形式有所变化。《秦王破阵乐》自初唐至晚唐,流传了近300年,不仅在中原流行,还传到吐蕃、日本,成为中外闻名的乐舞。

## 9. 唐代的《霓裳羽衣舞》

《霓裳羽衣舞》是唐代的大型乐舞套曲。据说这套乐舞的音乐是唐玄宗创制的,他先创作了乐曲的前段,然后再加上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进献的《婆罗门曲》,组合润饰而编成全曲。《霓裳羽衣舞》是唐代音乐、舞蹈、诗歌三者结合的大型乐舞大曲形式。其音乐情调幽雅清丽,接近“清乐”的风格,故属于“法曲”。作品着力渲染了虚无缥缈的天外世界,反映了求仙访道的思想。

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对这一乐舞作了生动的描绘。舞者被装扮成一位婀娜多姿的仙女式人物,下穿虹霓般的淡彩色裙子,上穿羽衣、披霞帔,头戴步摇冠,周身佩戴许多珠翠。整套乐舞在结构上共分3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散序”,有6小段,属乐舞的序幕,舞者不舞,仅有器乐演奏,磬、箫、箏、笛依次进入,节奏自由,乐曲舒缓优美,营造出悠然朦胧的气氛。第二部分为“中

序”，有 18 小段，舞者开始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舞姿轻盈飘逸，着意表现天界的仙女形象。第三部分为“入破”，有 12 小段，音乐节奏逐渐加快，舞蹈也更为热烈，直至达到精彩的高潮，乐舞在急促的节奏中戛然而止，乐器长奏一声，全舞结束。舞蹈中大量运用了舞袖、舞腰、旋转等技巧，创造了多种意象，充分表现出一种飘飘欲仙的意境。通过白居易的诗句“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我们可以想象舞蹈的美妙。

虽然唐玄宗创作这套乐舞出于他追求声色之乐和幻想成仙的意图，但并未影响作品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及其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在音乐上，作品将中原清商乐的含蓄婉转、清丽悠扬与印度佛曲的空幻缥缈融为一体，成为中外音乐文化融合的杰作。在舞蹈上，作品中传统舞姿的柔媚典雅与西域舞风的俏丽明朗水乳相交，形成了既保持本民族舞蹈神韵，又融入外来风情，既不同于健舞，又有别于软舞的特殊风格。正因为上述特点，《霓裳羽衣舞》不仅是唐代乐舞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珍品。

在唐代，《霓裳羽衣舞》的演出形式并不完全固定，既有独舞，也有双人舞和群舞。独舞以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表演最为著名。玄宗生日时，宫女曾表演大型群舞。白居易在诗中描写的舞蹈，是他于宪宗元和年间在宫中看到的双人舞。文宗开成元年(836 年)，教坊也以 15 岁以下少年 300 人表演了大型群舞。

## 10. 唐代的“健舞”和“软舞”

唐代在宫廷、达官贵人家宴以及民间广泛流行的小型娱乐性、表演性舞蹈，大体可分“健舞”和“软舞”两大类。

“健舞”多来自西域，其特点是节奏明快、矫捷雄健。据《教坊记》和《乐府杂录》等书记载，当时流行的健舞有《阿辽》《柘枝》《拂林》《大渭州》《黄獐》《阿连》《剑器》《胡旋》《胡腾》《杨柳枝》等。其中《剑器》《胡旋》《胡腾》《柘枝》最著名，艺术水平也较高。《剑器》舞姿健美，气势磅礴，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描写这一舞蹈：“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据后人考证，《剑器》是由女性着戎装，双手执剑而舞的，当是一种英武刚劲的舞蹈。《胡旋》原流行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及中亚一带，从北周至隋唐，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旧唐书·音乐志》说此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可见这种舞蹈的动作特点是以急速连续旋转为主，节奏鲜明，轻快敏捷。据载，舞者多在圆地毯上表演，舞姿急促多变，像雪花空中飘动，像蓬草迎风飞舞，千旋万转，如同奔跑的车轮，飞卷的旋风，令观众目不暇接。《胡腾》自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一带)传来。舞者头带尖顶帽，身穿窄袖“胡衫”，腰束带，足穿锦靴。舞蹈以跳跃和急促多变的腾踏舞步为主，舞者腾空旋转，幅度大，节奏快，腰间佩戴的装饰品发出“砰砰”的响声，随着欢快的乐曲，腾踏加快，反手叉腰，仰身下腰，形如弯月。《柘枝》也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舞蹈。伴奏以鼓为主，舞者在鼓声中出场，舞姿变化丰富，有时刚健明快，有时婀娜柔美，舞袖时而低垂，时而扬起。快速复杂的舞步，使舞者佩戴的金铃发出清脆的响声，舞蹈即将结束时有深深的下腰动作。

“软舞”的特点是舞姿优美柔婉，节奏舒缓，但也有些快节奏的舞段。《教坊记》和《乐府杂录》

等书中记载的软舞有《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借席》《乌夜啼》《凉州》《绿腰》《屈柘枝》《甘州》等。其中较著名、技艺水平较高的有《绿腰》《凉州》《春莺啭》《屈柘枝》。《绿腰》又名《录要》或《六么》等。唐代李群玉在《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诗中说：“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华筵九秋暮，飞袂拂云雨。翩如兰苕翠，婉如游龙举。”“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坠耳时流盼，修裾欲溯空。唯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生动地描绘了这一舞蹈的优美舞姿。《凉州》又名《梁州》，唐代的凉州即今甘肃武威。软舞《凉州》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乐舞。唐代张籍的《旧宫人》诗有“歌舞凉州女，归时白发生”之句，可见唐代宫中有凉州的歌舞伎人，他们将《凉州》乐舞带入了中原。《春莺啭》是宫廷乐工白明达创作的乐舞。白明达是龟兹人，因而乐曲具有龟兹音乐的风味。元稹的《法曲》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听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舞蹈的舞姿娉娉柔曼，多姿多彩，队形变化也非常丰富。《屈柘枝》又名《屈枝》，由两名少女相对而舞，少女头上戴着舞帽，帽上系有金铃，舞蹈时发出清脆的铃声。《屈柘枝》与健舞《柘枝》在服饰和表演形式上已很不相同，可能是《柘枝》在流传中形成的新的表演形式。可见，即使是较具中原传统特色的软舞，也吸收了不少外来的因素。

## 11. 唐诗的成就和特色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辈出的名家，如林的杰作，不仅为时代增添了光辉，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唐诗创作之繁荣，流派之众多，风格题材之丰富多样，各类诗歌体制之完善齐备，皆表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唐诗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既与当时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心态活泼开放、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客观条件有关；也是诗人们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广泛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结果。

从唐诗的发展历程看，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被后人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初唐诗坛的代表。他们不满内容空洞、形式呆板的宫廷应制诗，要求抒写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和悲欢离合的人生感慨，从而推动诗歌题材“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唐诗杂论》），开启了一代新风。同时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总结了前人对诗歌声律的研究探索，使五言、七言格律诗的形式趋于定型，诗歌的体制更加丰富多样。

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众多著名诗人同时出现，诗歌创作全面繁荣，充分展示出盛唐的风貌。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说：“李翰林（白）之飘逸，杜工部（甫）之沉郁，孟襄阳（浩然）之清雅，王右丞（维）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他们的作品兴象超妙，韵律谐和，表现了这个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当时的诗歌内容也异常丰富，其中边塞战争和田园山水是两个重要题材。代表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是李白和杜甫，他们的作品风格不同，但在艺术上同样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中唐时期，唐王朝经“安史之乱”后，有所恢复，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诗坛又活跃起来。白居易、元稹等诗家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政治讽喻诗，继承杜甫揭露现实、批评时政的宗旨

而有所发展。白居易和元稹对长篇歌行的创作也卓有贡献,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此外,韩愈、孟郊、李贺、贾岛等人也各出新意,别具一格,留下了许多杰作。

晚唐的著名诗人有杜牧、李商隐等。他们的诗作哀怨深沉,充满伤时忧国的感喟,给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的感觉,实际上也是唐王朝趋于没落的真实写照。他们对诗歌的艺术技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的诗作律对精切,文词清丽,笔意宛转,情味隽永,达到了新的境界。

唐代诗人的创作不仅形成了众多的风格流派,还促进了诗歌体制的多样化发展,正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对唐诗的评论:“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宋代以后的整个中国古典诗体,都没有越出唐诗的范围。后代诗人正是凭借唐代诗人开拓的丰富多彩的形式,才获得更大的空间来表现多种内容和题材。

总而言之,唐诗以其深刻感人的思想内容、丰富多彩的题材形式、绮丽纷呈的风格流派和精妙绝伦的艺术技巧,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巅峰,也成为后人仰慕和取法的典范。

## 12. “诗仙”李白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称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幼时随父亲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现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父李客曾在西域经商,并推断李白出生于碎叶,但并无确凿证据。李白少年时代即博览儒家经典、文史名著及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后来信奉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后人称他为“诗仙”,除因其诗笔出神入化外,还与其浓厚的道教出世思想有关。同时,他又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积极入世、关心国事,这是其思想的另一面。李白约于二十五六岁时离开四川,长期在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漫游。天宝元年(742年),他受人推荐,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时值玄宗后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李白遭受权贵谗言诋毁,仅一年多即被迫辞官离京。此后十余年间,心情苦闷的李白继续在全国各地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天宝三年(744年),他在洛阳与杜甫结为挚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怀着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料李璘兵败被杀。李白因此受牵连,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中途遇到大赦,得以东归。晚年漂泊困苦,62岁时病逝于当涂(今属安徽)。

李白的诗歌散佚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非常丰富。他关心国事,了解社会,不少作品对政治的腐朽黑暗作了尖锐的讽刺,对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同情和关怀。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并因此写下许多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在他笔下,咆哮万里的黄河,白浪如山的长江,“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蜀道,“回崖沓嶂凌苍苍”的庐山,无不形象雄伟,气势磅礴。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句。人们从中可真切地感受到他在吟咏高山大川时所展现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怀。李白还写下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感情真挚,

动人心扉,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过,李白有些作品也流露出人生若梦、颓废放诞的消极情绪。

李白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自由解放的体裁和朴素优美的语言来表现他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由于深受屈原的影响,李白的诗歌极富想象力,具有瑰玮绚烂的浪漫主义色彩。

就体裁而言,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他的五言古诗,语言朴素生动,情感真切热烈,很有特色。他的七言古诗更具创造性,往往除七言句外,兼采长短不齐的杂言句,使雄伟壮阔的气势和奔放激荡的情感,跳动于字里行间。李白的绝句写得蕴藉含蓄、意味深长,极受后人赞赏。李白尤擅长乐府诗,他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又能自出新意,写下不少优秀诗篇。

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许多著名诗人,如唐代的韩愈、李贺,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陆游等,都或多或少受李白的影响。

### 13. 苏六朋《太白醉酒图》

清代画家苏六朋所作的《太白醉酒图》为纸本设色立轴,纵 204.8 厘米,横 93.9 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苏六朋字枕琴,号怎道人、罗浮道人,广东顺德人。自幼学画,后以卖画为生。善画人物,取法宋元,运笔流畅,颇具奇思。此图画李白醉酒于唐玄宗的宫殿内,内侍二人搀扶侍应的情景,人物造型很准确。李白戴学士巾,面部用工笔描绘,眉宇间流露出高傲之态,神情非常生动。李白身穿色调鲜明的白色宽袖朝袍和朱色靴,与内侍灰暗的服饰形成对照,更衬托出李白蔑视权贵、傲岸不驯的个性。整图构思十分巧妙,是画家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创作的著名作品。

### 14. “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 年),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他在诗中曾自称少陵野老,故后人也称他杜少陵。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他 7 岁就开始学诗,15 岁时的诗文已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玄宗开元后期,未考中进士的杜甫在各地长期漫游。天宝三年(744 年),他与李白结为挚友,后寓居长安近 10 年。“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辗转逃到凤翔,谒见肃宗,受任为左拾遗。长安收复后,杜甫随肃宗返京,不久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其后,对政治深感失望的杜甫辞去官职,迁居成都。他于城西浣花溪畔修筑了草堂,在以后的数年中得到一个远离喧嚣的栖身之处。后来,他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中任参谋,并被严武举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世人因此尊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晚年携家离开四川,乘船东下,病逝于途中,终年 59 岁。

杜甫诗歌创作最显著的特点是将社会现实与个人遭际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后人尊称他为“诗圣”,不仅因为他高超的艺术成就,还因为他体现了儒家

追求的理想人格,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杜甫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变化,在个人仕途屡遭挫折、生活颠沛困窘的同时,也感受到社会矛盾的尖锐和人民苦难的深重。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对政治的黑暗和腐朽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而被称为“诗史”。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丰富多样,尤以“沉郁”为主,语言之精练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元稹为杜甫写的墓志铭称:“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杜甫擅长驾驭诗歌的各种体裁,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的五言古诗长于写景叙事,生动而自然;七言古诗长于抒情,豪放而沉郁;五言、七言律诗功力尤深,成就极高,其数量也占杜诗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杜甫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 15. 王维及其田园诗

王维(约701—761年),字摩诘,祖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王维年轻时即富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721)考中进士,初任大乐丞,后逐渐升迁至给事中。然而,王维的心中始终很矛盾,他信奉佛教,向往山水田园间悠闲的隐居生活,对当时的官场颇感厌倦,但又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曾居处山林,中年以后一度居于终南山,后又得到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别业,遂与好友裴迪优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安史之乱”时,叛军占领长安,王维为叛军所获,曾受伪职。叛乱平定后,任太子中允。后官至尚书右丞,世人尊称他为王右丞。

王维的诗歌现存不足400首,其中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的是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光以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他善于通过山水田园的描绘,抒发其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他还特别喜欢缔造静谧恬淡的意境,表现了佛教禅宗的趣味,并从中透露出一切皆空的世界观和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因而后人称他为“诗佛”。明代胡应麟《诗薮》即称王维的五绝“却入禅宗”,又说《鸟鸣涧》《辛夷坞》二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从艺术手法看,王维的写景诗篇,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体物入微,状写传神,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王维在描绘自然风光上的独特风格和高度成就,使他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维不仅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擅长书画和音乐。深湛的艺术修养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诗、书、画、乐的巧妙融合,相得益彰,更使他的作品富有一种独特的韵味。王维的诗在其生前及后世都享有盛名。史书上说他“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新唐书·王维传》)。杜甫也称他“最传秀句寰区满”。由于他的人生哲学和审美情趣极受文人赞赏,王维在后世文人中的影响尤为深远而广泛,并被视为与李白、杜甫并列的杰出诗人。

## 16. 《文苑图》

《文苑图》为绢本设色图卷，纵 37.4 厘米，横 58.5 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画无作者款印，左上角有宋徽宗瘦金体墨题“韩滉文苑图”“丁亥御札”，其下为徽宗花押“天下一人”。因此，《文苑图》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唐代韩滉的作品。韩滉(723—787 年)，字太冲，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官至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晋国公。韩滉平生好鼓琴，精书善画，书法得张旭笔法，绘画擅长人物、动物和田家风物；著作有《春秋通》等。此图描绘了四位文人学士相聚吟诵属文的情景。图右一人就石舒卷，右手支颐，握管向上，似正觅句构想，一童子研墨伺候于旁。正中苍松盘曲，一人笼袖依松站立，凝目沉思。图左二人并坐于石上，展卷共观，居右者回顾仰视，若有瞻望。四位文人情态传神。该图笔法简劲流利，衣纹略作颤笔，设色淡雅，格调超逸。

画卷除徽宗墨题外，四角有双龙及“宣和”年号印骑缝，右下角有南唐墨铃朱文“集贤院御书印”。其著录见于南宋《中兴馆阁录·储藏》。由此可见，这幅画卷当为北宋之前的作品。但有当代学者考证，认为此图实为五代时期的绘画风格，故作者可能为五代的周文矩，是他所作《琉璃堂人物图卷》的后半幅，可备一说。

## 八、参考书目

1. 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2. 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 年版。
3.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
4. 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5.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三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